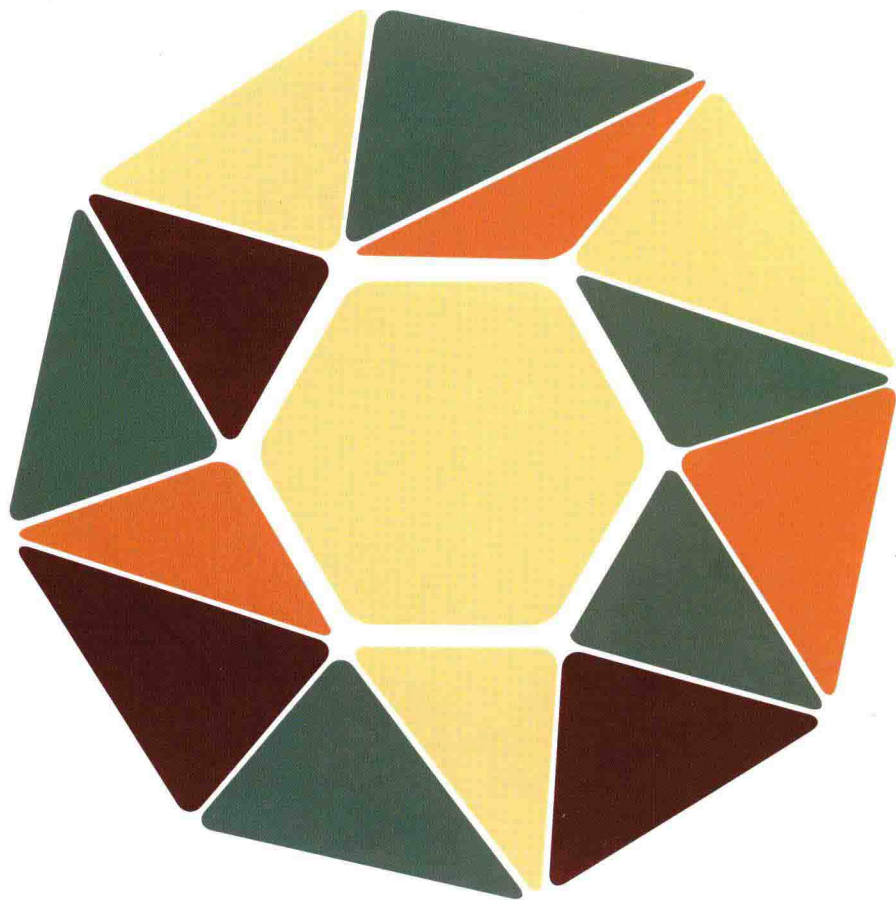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丛书 ④

作为区域研究的 日本学(下)

主 编 /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 王宗瑜 赵戈非

本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赞助出版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丛书 ④

作为区域研究的 日本学(下)

主 编 /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 王宗瑜 赵戈非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 汉、日 / 杨伟, 罗国忠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229-07036-6

I. ①作… II. ①杨… ②罗… III. ①日本—研究—
文集—汉、日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8186号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册)

ZUOWEI QUYU YANJIU DE RIBENXUE

主 编 杨 伟 罗国忠
副主编 王宗瑜 赵戈非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雷 刚

封面设计: 崔 琦

装帧设计: 袁 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http://www.21txbook.com>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幢8楼 邮政编码: 401121

电话: (023)6365893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533千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9-07036-6

定价: 58.00元(上、下册)

本书所使用方正字体经北大方正公司授权许可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 023-636589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本书出版之际

日本,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他者。作为异文化的日本文化,其地域性和独特性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而近年来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更是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如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正逐渐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内日本研究现状的不满声音也越来越强烈,认为《菊与刀》对中国人日本观的绝对影响力恰好反证了中国人日本论的缺失或落后。首先,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划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却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其次,各传统学科因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大有被边缘化之虞;而以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感到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区域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决策的依据,并成为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以形成跨学科研究局面的“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无疑代表了日本研究的新方向。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同时,它又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应该是通过导入比较文化的视点,凭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中日文化间的差异为出发点,涵盖了日本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军事、文学、语言等众多领域的整体性研究。它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又必须要超越这种现实性。即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

领域也足以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

为此,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下,与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合作,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 22—23 日和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举行了题为“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一)——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二)——以事例研究为中心”的两次国际研讨会。2011 年的会议邀请了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法政大学教授王敏、菱田雅晴、小秋元段、高柳俊男等日本学者就区域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进行讲演,2012 年的会议则邀请了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铃木贞美,早稻田大学教授坪井善明、梅森直之,以及法政大学教授小秋元段、曾士才、金原瑞人等著名学者作为特约嘉宾进行讲演,而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厦门、成都、洛阳、天津、济南、青岛、杭州、贵阳等地的国内学者也踊跃参会,两次的与会者共计约 150 名。通过这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梳理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的概念,从理论上探讨了构筑这一综合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至关重要的方法论。中日学者们以各自的领域为基点,从跨学科或者区域比较的视点出发,并以各自领域的事例研究为中心,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既达成了学术交流的目的,也推动了中国跨区域性日本研究网络的有机形成。

为反映这两次研讨会的成果,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从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遴选出部分佳作,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的出版资助,在重庆出版集团的大力支持下,编辑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两册,结集出版。通过上册的 23 篇论文和下册的 18 篇论文,可以分别管窥到 2011 年和 2012 年两次国际会议成果的一斑。

在本书出版之际,作为主编,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出版集团的编审江萍女士和编辑雷刚先生,以及上海出版界的陈勤女士。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让我们由衷敬佩。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

杨 伟

2013 年 9 月 7 日

目 录

【上册】

- “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
——兼论其意识形态机制 杨 伟/文(001)
- 『愚管抄』と『神皇正統記』
——中世日本における二つの天皇観—— 小秋元段/文(008)
- 地域における国際関係・民族間関係の過去・現在・未来
——長野県飯田・下伊那地域を舞台に 高柳俊男/文(016)
- 在中国,漱石为何被广泛解读?
——解读“漱石文化圈” 王 敏/文 朱 捷/译(024)
- 替罪羊的呐喊
——对大江健三郎《人羊》的另一种解读 胜又浩/文 李 玄/译(032)
- 论王敏的官泽贤治研究 雷 刚/文(037)
- 『蛇にピアス』試論
——〈悪女〉の成長をめぐる物語として読む 蒋 葳/文(046)
- 伝統への回帰
——李修文の『滴泪痣』と谷崎潤一郎の『春琴抄』—— 尹永顺/文(057)
- 永井荷风笔下的清末上海
——以《上海纪行》为中心 钱晓波/文(065)
- 从《维庸之妻》看太宰治的“义” 陈潇潇/文(072)
- 夏姫像の比較研究 段云兰/文(079)

林罗山的文章与《古文真宝后集》	陈可冉/文(088)
对于《日本灵异记》中卷第二十四缘之冥界故事的考察	潘 宁/文(097)
关于辛亥革命前后旅日留学生的戏剧活动的研究	丁 曼/文(106)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财界人士对世界形势的认知 ——以村田省藏 1937 年的《年头所感》为中心	王宗瑜/文(113)
近代日本小学教科书与亚洲观的形成	谭建川/文(121)
江戸时代幕府的清朝认识 ——以《清朝探事》为中心	屈亚娟/文(129)
草庵茶室における利休の時間意識 ——待庵を例として	黄 婕/文(139)
出来事生起のありかたを表す副詞の分類	彭玉全/文(147)
音声教育における日本語アクセント指導法	崔春福/文(157)
概念メタファーと日本語の教授	徐 琦/文(165)
日本人の“夫婦呼び名”考	徐 曙/文(173)
小议当今日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以日本“飞特族”问题及其对策为中心	田莎莎/文(179)

【下册】

区域研究中的三角测量法 ——以日本的越南研究为例	坪井善明/文 唐先容/译(186)
超越“占领中心史观” ——对于不平等的发现	梅森直之/文 王宗瑜/译(190)
从概念建构史的立场看日本帝国大学制度	铃木贞美/文 杨 爽/译(207)

昭和历史语境中的草野心平与中国	
——以其中国体验和亚洲意识的变迁为中心	杨 伟/文(216)
遗留日本的中国人	
——构成札幌华人社会的人们	曾士才/文 杨 羽/译(227)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日本财界人物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距离	
——村田省藏的中国认识及其化为泡影的莫斯科之行	王宗瑜/文(239)
论近代中国“进化史观”形成的日本背景	
——观念、资源与契机	杨 羽/文(247)
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以 1906 年官派“调查日本监狱员”为中心	孔 颖/文(257)
《徒然草寿命院抄》与《本草序例》注释	小秋元段/文 陈可冉/译(264)
《本朝一人一首》版本考订	陈可冉/文(274)
从横写到竖写	
——辞典、绘本与漫画	金原瑞人/文 胡小语/译(282)
《哥儿》的“不安”	
——作为小人物形象的“我”	细谷博/文 冯 千/译(294)
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神经衰弱	杨 爽/文(302)
女性嫌恶与宗教回归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1Q84》	张小玲/文(312)
再论日语教材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李光贞/文(321)
论日语拒绝邮件中的“配慮表达”	章羽红/文(329)
动态语境中日汉条件构式的教学反思	毛青兰/文(338)
象似性与日语习得	徐 琦/文(344)

区域研究中的三角测量法

——以日本的越南研究为例

早稻田大学 坪井善明

[摘要] 本文以日本的越南研究为例,提出了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五个课题,并认为从各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乃是区域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三角测量法又不失为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切实可行的上策。

[关键词] 区域研究 比较的视角 三角测量法

引言

我的恩师坂野正高教授(1916—1985)是专攻中国外交史的学者,曾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名为“*China and the West: the Origins of Tsungli Yamen 1856—186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单行本。40年前,当我立志于越南研究进入师门时,恩师给我提出了作为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五大课题:1. 深入学习欧美国家发达的社会科学方法论;2. 为此必须掌握欧美的语言;3. 了解研究对象国的历史、社会以及其中的人;4. 为此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5. 好好了解作为母国的日本。经过40年的学习,至今仍旧坚信,这一教诲对于每一个从事区域研究的人而言都是必要的课题。

1. 日本的越南研究

日本的越南研究是由在越战时对越南抱有强烈共鸣和同情的一代人引领着进行过来的。在1986年的越南共产党第6届党代会上,通过了“Đổi mới政策”,决定走越南版的“改革·开放”路线。遵循这一改革路线,从1989年开始,越南打开国门,允许外国的越南研究者进入越南了。源于这一政策的积极影响,外国研究者们得以在越南与当地的研究者们一起,真正开始实施社会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了。

而在日本则成立了汇集日本越南研究者的“越南研究者会议”,得以在此频繁地交换信息。恰如日越的伙伴关系所象征的那样,随着日本与越南的关系日趋紧密,不限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环境学、农学、工学、IT行业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也开始频繁地造访越南了。

其实,越南研究的切入口是纷繁多样的。如今的研究正是从如下几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来进行的:1. 从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在内的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一视角;2. 从与同为东盟成员国的其他诸国相比较的视角;3. 从与同是旧法属殖民地的法语圈诸国相比较的视角;4. 从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各国在开发水平上相比较的视角;5. 从与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各国相比较的视角。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看看上述几种比较研究的视点吧。

(一)从文化方面对越南与日、中、韩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运用在历史、语言、统治制度等众多领域。而这正是通晓日韩情况的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可以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在关于各个国家如何从思想上应对西欧的大举进入抑或侵略等问题上进行比较研究,确实令人兴趣盎然。在日本被称作“和魂洋才”,在中国称之为“中体西用”,而在韩国则叫做“东道西器”,即是说,在维护本国传统精神的同时,也不忘积极引入西洋的技术——这是东亚三国共同的态度。

(二)快速发展的东盟诸国据称将在 2016—2020 年间实现经济统合,形成与欧盟相同的单一市场。但首先在宗教方面,这里却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多种宗教混杂在一起,而在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速度等方面,成员国之间也是参差不齐。其次,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就与没有纷争的亲华派国家大相径庭。再者,围绕着工业化、吸引外资等问题,成员国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迅速开放,奋起直追的缅甸等,都在众多的产业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诸如此类在各种领域的差异削弱了作为区域统合的东盟的向心力。当考量越南现在的经济、社会、政治时,东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忽略了与东盟诸国进行比较,就不可能正确把握越南的真实情况。

(三)越南至今仍然属于“法语圈”。与同属法语圈的非洲各国一样,越南与法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在各方面都还保留着法国殖民地时代的遗产,所以,与同属法国殖民地的其他各国进行比较,也无疑是深化对越南理解的一个视角。的确,法国曾将越南殖民地化,建立了其统治体系,并引进了断头台,对进行抵抗的越南革命家施以残酷的镇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带来法国革命的真理,带来了作为人类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正是利用这些人类的普世价值,胡志明指出,“法国的言行存在着矛盾。既然人类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自由平等’,那为什么法国人要跑到越南来镇压越南人呢?越南人也理应可以正当地享受这个权利”,并发动了革命运动。而法国也对旧体制中被视为亲法派的越南人的政治逃亡予以认可和接纳,允许他们取得法国国籍。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背景,所以,越南人对法国人的印象并不是很糟糕。换言之,相互间的“历史认识”已经确立。

当有人向一名越南高官问及“法国曾经将越南殖民地化,可为什么越南还要加入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法语圈呢?”的时候,他回答道:“越南有着 2000 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成为法国殖民地的时间只有 60 年而已。毋宁说现在在越南,法国殖民地的遗产是作为‘French Taste’而被享用的。”

(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将越南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以比较,是认识当今越南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 1990 年开始便发布“人类发展报告书”,在 1994 年时,越南在 187 个国家中居 120 位。到了 2011 年,仍然处在 128 位的低位(中国为 101 位,韩国为 15 位,日本为 12 位)。尽管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1 000 美元,但在保健、医疗领域以及教育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改善空间。

(五)从社会主义体制的角度加以比较,也是一个重要的视点。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在卡扎菲领导的“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被推翻以后,越南就成了国名还带有“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国家了。如今,改宪在越南已成为热议的话题,历史学会等提出要将现有国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成胡志明缔造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与中国、朝鲜、古巴等宣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比较研究,对理解越

南也大有帮助。特别是越南在整个制度、法律、经济体系等很多方面都曾受到苏联的重大影响,所以,与苏联之间的比较即便在今天也不无裨益吧。

在日本,比较盛行的是(一)、(二)、(四)、(五)几个方面的研究,呈现出集中于某个专门的领域来深入研究越南特性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越南研究得到了深化,但却弱化了比较研究的态势。特别是在年青一代的研究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越南的大学长期留学,熟练地掌握了越南语,并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这对于理解当地社会和当地的人,用当地的语言与当地的人接触,从而加深相互的理解等非常有用,但同时也暴露出另一些弱点。即不少研究者只知道越南的事情,只对越南感兴趣,从而陷入了狭窄的视野。不少人习惯于使用只在狭小的学界中才能被理解的“行话”或“专门术语”,并以此为乐,自我陶醉。

因此,有必要拓展自己的视野,充分意识到读者的存在,选择世界上每个读者读起来都倍感兴趣的表达方式。为此,从各种角度来进行比较乃是绝对必要的吧。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三角测量。

2. 区域研究中的三角测量法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为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领域那样,依靠实验来验证假想,所以,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依靠进行多种多样的比较,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对象物具有怎样的特征。比如,为了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就可以依靠追溯历史,历史性地比较过去的中国社会和现在的中国社会,从而寻找出其变化的轨迹。另外,借助与韩国、日本、越南等文化上相近的诸邻国进行比较,可以从文化和空间上更为详细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特征。再比如,通过与曾被叫做“列强”的美国、英国、俄国等大国进行比较,可以多方面地分析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实力。当然,依据采用什么标准来进行比较和从什么视角来进行比较,都会导致研究的品质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是研究越南政治的,在研究中我有意识地采用了三角测量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一边往来于越南、法国、日本之间,一边分析越南。当然,我也非常关注其他的国家,比如美国、中国、韩国等与越南关系密切的国家,但作为其基轴,我选定的是日本、法国和越南。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下面这两点:一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乃是日本人,骨子里浸润着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因此从研究主体的立场而言,是不可能置日本于不顾的。二是,在分析近代越南的政治时,不可能对殖民统治越南长达 80 年的法国的影响视而不见。

实际上,我具有在法国生活 10 年以上的经历,而且现在还以每年 2 至 4 次的频率前往法国进行考察。虽说我只在越南呆过 2 年半,但近年来,几乎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进行访问,所以这意味着我一年中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越南。

三角测量法有很多的长处。首先,较之以两点为基准,显然以三点为基准的比较更为稳定可靠。比如,虽然只对日本和越南进行比较也可以构成一种研究,但若是没有第三者的视点,就很容易陷入主观性。其次,把文化和历史都各各不同的三个国家放在一起考量,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报,所以,比较起来也更加多姿多彩。并且,由于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可以切身体会到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这种三角测量的方法,曾由人类学研究者川田顺造导入文化方面的研究中。30 年前我从他那里学习到这种方法,并一直作为重要的参考。川田教授曾以日本、法国和西非的莫西族等三个民族为三角测量的基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

虽然日本和法国同属资本主义国家,但思维方式却是不同的。据说日本属于对人依赖型,而法国则属于非对人依赖型。换言之,在日本,人的努力都完全是朝向人的,无论是学习,还是技术的掌握,在质与量上都追求的是人的修炼。举个例子吧,在日本,木匠使用的刨子乃是非常简单的工具,一旦掌握了方法,就可以用来切削木材,并且可以采用好几十种方法。经过10年以上的学徒生活,木匠们所掌握的技术就能达到这种境界。在提高精巧性、多功能地运用工具这层意义上,日本强调的是对人的身体功能在质上的依赖。此外,就像有个广告词叫做“工作24小时吗?”那样,还有对不惜投入人的全力这样一种对人的身体功能在量上的依赖。总之,表现为人依靠自己百分之百的努力,来试图获得成功的态度。这就是所谓对人依赖型的缘由。

然而,在法国则普遍认为,人要尽可能远离劳动,去享受余暇才是“人性的”。因此,法国人思考的是人如何才能轻松享乐。在他们看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制造出代替人的机械。换言之,为了由谁来生产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好结果,就要想办法制造出工具等物质性的装置。在尽可能不依赖于人的能量来进行工作这层意义上,这属于非对人依赖型。比如,还是以刨子为例吧。法国人把精力倾注在了发明谁都可以使用的电动刨子上。一旦发明了电动刨子,并加以实用化,不仅木匠,就连门外汉也能轻松地切削木材。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店也一样,准备了一本厚厚的操作手册,其目的是不管谁在打工,都能烤出同样美味的汉堡包,为顾客提供相同的服务。也就是说,只要按照那本手册行事,谁都能做出同样味道的汉堡包。

但是,西非的莫西族却既不是对人依赖型,也不是非对人依赖型,而是“依赖状况·活用状况型”。这是因为那里的自然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的缘故。比如,使用数十台推土机来平整土地,以便实现用水灌溉。但西非的旱季由于太阳长期炙烤,使灌溉用水干涸,造成农作物枯萎。而到了雨季,则是大雨滂沱,造成洪涝,也会破坏灌溉用水,使农作物被浸泡在水中,无法收成。但当地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自然的淫威,了解了自然的法则,掌握了顺应自然、运用自然的智慧。因此,尽管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宣称要使用无息贷款等来支持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认为只要引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就能够给当地带来发展和繁荣,于是将自己的经验和做法照搬进非洲,结果却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西非的莫西族和越南大相径庭,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却有着共同之处。比如在越南即使弄丢了汽车钥匙,只要把现有的金属零件加以巧妙的整形,瞬间就会制造出汽车钥匙的复制品,让发动机转动起来。把手上现有的东西加以巧妙的加工,制造出完备的整体——这样一种英语里叫做“bricolage”的做法还延续在生活中。

如此这般地不仅把自己生活的国家和研究对象国,同时也把第三国或民族纳入比较的对象,就会看到在原来的两者间看不见,但在三者的关系中却会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诸位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三角测量法。

(唐先容/译)

作者信息:

坪井善明:男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

研究方向:越南研究 东南亚研究

E-mail: yotsuboi@waseda.jp

超越“占领中心史观”

——对于不平等的发现

早稻田大学 梅森直之

[摘要] 当下的日本有着以安倍晋三的“战后体制论”与鸠山由纪夫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为代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日本战后认识,其实质都是强调美国的占领政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因此这两种认识可被统称为“占领中心史观”。该史观的原型乃是江藤淳的“亲美爱国”思想。本文通过对亚洲的“忘却”过程以及江藤淳在美国访问期间对美国南方以及不平等问题的“发现”过程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亲美爱国”思想与“占领中心史观”的成立过程。

[关键词] 占领中心史观 江藤淳 美国 不平等 南方

引子

所谓“战后”,并不仅仅意味着从1945年8月15日到现在为止的日历上的日期。它与所有其他的时代划分相同,总被大家看做是带有一定政治性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就构成了围绕“战后”这一概念的思想史。“所谓‘战后’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出现,应当是与“战后”这一时代划分的出现时期相一致的。其出现的契机之一,就是与“告别战后”这一提法同时出现的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此后的50余年来,“战后”一直都是日本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注点。以“战后”为主题的历史研究的出版状况,尤其自战后50周年(1995年)左右开始呈现出一种盛况,迄今仍未出现减弱的势头。无可否认,不同的人将“战后”问题化并加以解决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在各种“战后”认识当中,有的占据了支配地位,有的则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通过对占支配地位的“战后”认识进行分析,我们不仅能明了提出该认识的人的思想及经验,同时也能够厘清特定的时代状况——使该认识成为可能或者需要该认识出现的特定的时代状况。“战后”认识的变迁是不断变化的日本自身的一个指标。因此,对其进行系谱式的分析,有助于剖析构成各时段日本的政治性及社会性的力学关系。

近年来的政治有一个明显倾向,即政治家会就自身政策与“战后”体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积极的讨论。例如,2006年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安倍晋三,为了推进其旨在强化爱国心的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以及将修宪纳入视野的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政策,赋予了上述政策“脱离战后体制”的意义,将其置于有关“战后”的历史认识的语词之中^[1]。而2009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鸠山由纪夫则将“重视亚洲外交”视为重要的政策性课题,并将“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其重要支柱加以强调,而构成该政策的基础则是鸠山由纪夫的“战后”认识——“正是日本,给众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与痛苦,即便在已经过去了60多年的今天,仍然不能认为已经达成了真正的和解”^[2]。立场相互对立的两届政府领导人的上述演讲当中,清晰地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战后”认识。政治家在对占支配地

位的“战后”认识进行动员以便使自身的政策正当化的同时,其政策的制定也受到了该认识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安倍与鸠山的“战后”认识理解为当下日本颇具代表性的两种类型。安倍所说的“战后体制”是指对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强化军事实力等政策加以限制的整个体制。其上述认识建立在如下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即阻碍日本如同一个主权国家一般地自律的体制,是以《日本国宪法》的制定为首的、自1945年以后从东京审判至占领改革的一系列历史潮流所形成的,而起主要作用的则是美国。安倍的“战后体制论”实质上是一种将美国的“过剩”视为问题的言论,该言论认为美国的“过剩”才是造成日本缺乏主体性的重要因素,而民族主义与军事实力的强化则被认为是恢复日本国家主体性的良方。

与此相对,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同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战前的观念性、等级性的亚洲认识,其特点在于强调亚洲各国之间在经济、环境、传染病以及抗灾防灾等具体领域的平等合作。若要实现这些合作,就必须通过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的人才交流达致“相互理解”。“东亚共同体构想”就是在对于战后日本与亚洲的“交流”及对这种交流的“理解”极为不足的反省的基础之上加以推行的。换言之,“东亚共同体构想”是将战后日本社会当中的亚洲“缺失”视为重大问题的一种言论,也是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修正来加强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立场。

众所周知,“战后体制论”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分别为意识形态与方向性各异的两个阵营所提出。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两者其实都立足于极其相似的“战后”认识基础之上。前者强调美国在战后日本实施的占领政策的重要性,这导致了同时代的亚洲各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边缘化;后者虽然将战后日本忘却自身对于亚洲的战争责任一事视为大问题,但这种态度之所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之上的日美同盟体制的成立及其强化。如此看来,在“战后”日本,美国的“过剩”与亚洲的“缺失”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两个阵营在对外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等相关层面相互对立、展开激烈的论战;但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两个阵营构筑并支撑起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的占支配地位的言说,即强调1945年之前与之后的历史的断裂性,将美国的占领政策视为造成这一断裂的主要因素并加以关注。笔者在此将上述历史观称为“占领中心史观”。

本文从解析政治与历史认识的关联性角度出发,将“占领中心史观”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对其进行系谱性的分析。本文所提出的假说就是“占领中心史观”的相对崭新性。由美国的“过剩”与亚洲的“缺失”所编织而成的言说,虽然目前已成为常识性的“战后”理解,但其最终占到支配性地位也不过就是近年来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战后最具代表性的畅销小说之一、五味川纯平的《人间的条件》^[3]就能明白。众所周知,该小说主要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作为劳务管理专家前往中国东北“满铁”旗下一处矿山的主人公棍在大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与对中国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的夹缝之间苦恼挣扎的形象。小说发表于1955年,共售出1300万册,成为畅销书。而且1959—1961年间还被渐次搬上电影银幕,获得了巨大成功(五味川[2005])。小说(以及电影)将脱离群众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扎根于民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希望进行了对比性的描写,成功地告诉了我们另一个与目前占支配地位的战后认识——美国的“过剩”与亚洲的“缺失”——不同的、略有欠缺的“战后”。该文本将一个时代的痕迹清晰地呈现于我们眼前:构筑“战后”日本的要素曾经是“战争”本身与亚洲,而不是“占领”与美国。

“占领中心史观”绝非在“战后”被视为问题的所有时期都占有支配性地位,它仅仅是在近年来的时代背景下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言说而已。换言之,要想让美国的“过剩”与亚洲的“缺失”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加以接受的话,就必须得让此前日本与亚洲的关系被“忘却”,同时还得将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赋予新的意义。那么,亚洲究竟是何时、怎样被“忘却”的呢?而美国又是何时、怎样被“发现”并成为日本的历史认识的一部分的呢?这种“忘却”与“发现”又是在怎样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言说”的呢?本章的目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代背景当中找出“占领中心史观”获取支配地位的契机,同时对日本对于亚洲与美国的认识发生变迁的过程进行剖析。

战后,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直接接触受到限制,而战前与战争期间则不同,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前往亚洲各地区并在那里直接接触到了当地的文化及居民。对于他们而言,日本与亚洲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他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这一前提条件自“战后”日本逐渐消失的时间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正好与所谓战前和战争期间那一辈人们从舆论舞台逐渐消失的时间段相重合。另一方面,通过太平洋战争以及对日占领的经验,美国成为“战后”日本最大的“他者”。但是,要想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实感将这个从敌国突然变成盟国的“他者”纳入自身的历史认识当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章将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江藤淳的一系列评论活动作为针对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并将江藤从 1962 年开始的两年美国访问作为一个重要契机而对其访美经历的意义加以考察。正是这一经历引导江藤“发现”了美国新的一面,并最终使他能够构筑起一种能让爱国与亲美这两者并存的历史认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随着老一辈的淡出,能够把握住日本与亚洲之间直接关联的那种认识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富足社会”的到来,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文化、思想领域,如何构建国家自尊心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江藤的历史认识被视为能在不改变既有的国际关系与资本主义秩序的情况下大力宣扬爱国心的一种理论,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占领中心史观”也就此获得了历史认识的正统性地位。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逐渐推进“脱亚”化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同时也是东亚经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韩国与“台湾”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同时也维持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中国内地也在“改革开放”大旗下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为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亚洲地区的这一变化在 1993 年的世界银行报告当中被称为“东亚奇迹”(The World Bank [1993])。报告强调称,包括日本在内的 23 个东亚经济体在 1965—1990 年期间,保持了高速、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换言之,这是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外部、长期被视为停滞象征的“亚洲”大举“脱亚”的过程的一种表达。若果真如此,则 20 世纪 80 年代不仅是日本“脱亚”的决定性时代,同时也可说是出现日本再度与亚洲邂逅的可能性的年代。也即是说,所谓的亚洲再也不是作为与“西洋”文明相对抗的“东洋”文明的旗手,而是与日本同样需要面对在快速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存在。对于现在日本所要邂逅的“亚洲”,应当在上述共同的“脱亚”经历的客观基础之上重新加以审视。

1. 成为“普通国家”的欲望

“现在的国际社会既不是无限制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也不是由完美‘王道’所支配的场

所。今天的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在头脑中对于目前国际秩序的‘文明化’程度有清晰的认识,不要忘记在世界上由共通的谅解所形成的行为基准是什么,然后作为一个与自身国力相符的‘普通国家’对各种情况加以处理。”^[4](坂本[1994:23])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政治思想史专家坂本多加雄就当时日本所面临的政策性课题做出了上述表示。他的上述意见,是直接针对日本于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期间的战争“合作”方式所受到的国际性批判而给出的。坂本认为现在日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一种承担作为“普通国家”的主体性责任的自觉,对于该问题的原因,他认为必须在历史认识的层面进行分析。坂本主张应在“历史研究”的外部设定一个叫做“来历”的领域,并对其重要性作了如下说明:“历史研究所追求的,……是对于‘原因’从外部的客观立场加以分析说明;而来历所提供的,……则是本人对当下的人生与社会所采取某一特定的实践性态度与方针的‘理由’。”(坂本[1995:28])在这个意义上,“讲述日本的来历,就是将日本和日本人所拥有的特质以及所经历的事实等,整理成一种能与面向未来的日本对世界的自觉态度所一贯相关联的言说”(坂本[1994:197])。若是当今日本处于一种无法提供作为“普通国家”本应提供的恰当的国际贡献的常态当中,那不就意味着当今日本主流的“来历”在言说化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吗?坂本就由此将问题的所在定式化了。

那么,现在主流的日本“言说”是什么呢?坂本将其概括如下:“关于战后的来历,只要回忆一下以被视为日本国宪法理念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为中心所展开的言说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回心’式的言说。在这里,战前的日本被描画为在非民主政体的领导下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式侵略战争之路,这一企图失败之后,日本民众开始觉醒,要求实现‘国民主权’并确立非武装路线的理想。”(坂本[1995:54])在坂本看来,在战后日本成为主流的上述“言说”是极其不恰当的,它造成现在的日本面向国际社会无法采取适当的言行,结果招致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诸多误解与批评。那么上述“战后”认识在何种意义上是不恰当的呢?答案是上述“战后”的“言说”并非是由日本人自身所建构,而是由“对日本举行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并实际制定了日本国宪法的盟军司令部”所构筑的(坂本[1995:55])。战后日本被批判为一个由于接受了他者的“言说”而“丧失了‘国民’自身语词的国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对于“构想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指明作为日本‘国民’的方向性的‘我们的言说’”一事,坂本强调了其重要性。

若将坂本的一系列工作视为成长为安倍内阁时期“战后体制”论的保守派“历史修正主义”的强势推动力的话,约翰·W. 道尔的《拥抱失败》^[5]一书作为再度确认“战后民主主义”的理念与价值的另一种言说则收获了自由派的喝彩。道尔在该书的日译增补版序言中,将他对于自己所描述的“战后”日本的“言说”的基本构想概括为:“对日本的占领留下了不少的问题。但那个时代充满着如今的我们已大部分失去的美好的东西。比如发自人们心底的、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望;比如真心实意认为‘民主主义’能够实现的理想主义;比如曾经的敌对双方迅速地重新建立起善意与信赖的身影。而最打动我的,莫过于有如此之多的日本人在社会各个层面顽强并乐观地拼搏这件事了。……日本人充分认识到了暴力的愚蠢,将不依赖于军事的和平作为他们的理想珍藏于心”(道尔[2004:viii])。道尔所追求的,是为了对抗保守“历史修正主义”的抬头,再度确认“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性价值。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找出在日本被占领期间民主化过程当中日本人的主体性来达成的。

从与坂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关联性来看,可将道尔的“战后民主主义”论概括为两个要点。首先,就其内容而言,道尔并未如坂本那般将战后日本的“和平与民主主义”视为从国

际社会“逃避的姿态”,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咒语(Mantra)”,它使得日本“国民”的立场能够积极朝向未来的这种“言说”得以成立(道尔[2004:16])。其次,关于这一言说的著作权问题,道尔与坂本的意见也不相同,道尔不认为上述言说的“作者”仅仅是盟军总司令部(美国)。相反,他用如下文字强调了该“言说”应当被视为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结合型模式”:

占领初期,美国人将一个名为‘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类似于树木的根部与树枝之间关系的改革方案强塞给了日本人。那是一个应该被称为自以为是的、凭空想象的、从所有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傲慢的理想主义化的、极为罕见的事例。……尽管如此,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理想,在日本生了根。既不是借来的意识形态,也不是被强迫接受的未来方案,而是作为一种扎根于生活的体验、作为一种抓住得来不易的机会而生成的果实,在日本生了根。和平与民主主义的理想作为精彩的、常常又会奏出不和谐音的各种声音呈现出来。(道尔[2004:5])

道尔的历史叙述所带来的重要效果,就是他再次向日本人确认了一件事——“战后”日本这一“言说”的著作权,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是属于日本人自己的。“我本人……对于日本人自身在形成日本的战后意识方面所起到的创造性效果……给予积极的评价”(道尔[2004:15—16])。强力主张日本人主体性的道尔的“战后”认识,对于因新民族主义的抬头而逐渐有些丧失自信的过去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而言,在鼓舞其民族自豪感方面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声援。

如上所述,“历史修正主义”与“战后民主主义”在当今日本构成一种主要的政治对立结构。但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又都强调了战前与战后的断裂性,并且都强调了占领(=美国)经历在造成该断裂性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这两点而言,上述两种立场都立足于同一种历史认识,它们对于可被称为“占领中心史观”的“战后”“言说”的构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是将占领时期描绘为屈辱时代的“历史修正主义”,也毫不掩饰其对美国的执着。例如坂本就曾在其著作后记中就其“来历论”的“来历”做出了说明。他在参观珍珠港时与一位父亲战死于日军偷袭珍珠港之际的美国妇女交谈时,不知如何回答对方,“只好说了点模棱两可的话”。坂本在书中对当时的那种尴尬进行了反刍:“只要这个世界上有‘日本人’和‘美国人’这种单词存在,我们就可能会面临不得不作为‘国民’、而非‘个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具有‘个人’语言的人,也许不会被称赞为世界主义者,而更可能仅仅被视为不具有‘国民’语言的人,或者是从属于完全丧失了‘国民’语言的国家的一个个人”(坂本[1994:253])。从这一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坂本所谓的“国民”语言,其初次出现是一位“日本”“男性”在向一位“美国”“妇女”说明自身立场时被构想出来的。若这一相遇出现在其他场合或是与另外某一个人相逢,那么“言说”的内容应当会有所不同吧。不过,在一个应当讲述美国的“言说”中,对于被设定为其特权性听众的“历史修正主义”而言,这种多样化的相遇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已被排除在外了(梅森[1999])。

2. 长期“脱亚”与短期“脱亚”

“日本在尚未修复与东亚邻国、尤其是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本质性关系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大国再次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日本在亚洲、尤其是在东